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梅厄·斯滕柏格的詩學：聖經作
為“意識形態文學”和“無誤解文本”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Jian, Cao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6 01:12:49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67

梅厄·斯滕博格的诗学： 圣经作为“意识形态文学”和“无误解文本”*

曹 坚

Meir Sternberg's Poetics: The Bible as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Foolproof Composition"

Cao Jian

20世纪80年代,圣经研究在西方学界成果斐然,形成了一种新的态势。如果说以往的多数研究着眼于圣经作者、编撰过程和历史背景的考证,那么此时已有相当一批学者专治圣经文本本身,尤其是它的叙事艺术。^①前者属历史批评法,是一种历时的阅读法,趋向于把一部圣经文本分解为散碎的部分;后者则属文学批评法,是一种共时的阅读法,旨在说明作者如何通过文学手段体现文本的整体性。^②针对圣经叙事的文学批评有三个基本预

* 梅厄·斯滕博格现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阿兹特(Artzt)诗学和比较文学终身教授,兼任美国杜克大学《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杂志编辑,并曾荣膺以色列政府授予的桂冠学者(Israel Prize Laureate)称号。

① Steven Weitzman, "Before and Af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Prooftexts* 27 (2007), 191-210, 此为191。

② Burke O. Long, "The 'New' Poetics of Alter and Sternberg,"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51 (1991), 71-78, 此为72, 77。

设:首先,读者眼前的圣经是一部前后连贯的叙事文本;其次,编写的历史过程、圣经故事的真实性、读者的诠释意图等,皆与圣经叙事的完整性无关;再次,透过圣经叙事的文学特征,可以了解文本的主旨。圣经叙事批评的长处在于,它把眼前的圣经文本作为关注对象,建构性地理解它,从而帮助读者发现故事本身的价值。同时,它既不忽视希伯来叙事文本内在的文学传统,又能避免超越文本自身的意思,把与之无关的内容强加于圣经故事。^①

在这一新的圣经批评潮流中,梅厄·斯滕博格是最主要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自1968年在文学(*Hasifrut*)杂志发表其拓荒之作“讽刺目光下的国王:大卫和拔示巴故事的叙事技巧”^②以降,斯滕博格一直是圣经叙事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在他看来,圣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它的文学性正是诗学应该系统阐释的,因而需要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圣经进行研究。^③1985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启动了一个新的研究丛书计划,着重于对圣经——特别是希伯来圣经——进行文学性研究。该丛书包括25部专著,共同特点在于推出一种内在于文本而非超越文本的阅读策略,即关注焦点在文本本身而非文本之外的事实。^④丛书推出的第一本专著即斯滕博格的名作《圣经叙事诗学:意识形态文学和阅读的戏剧性》(以下简称《诗学》)。^⑤尽管这部著作内容繁浩,语言晦涩,却一直是丛书中最畅销的。本篇短文试

① Gale A. Yee, *Judges & Method: New Approaches in Biblical Studie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7, 19-21.

② Meir Sternberg, "The King through Ironic Eyes: The Narrator's Devices in the Story of David and Bathsheba," *Hasifrut* 1 (1968), 263-292.

③ Poland, Lynn, "Defending Biblical Poetic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68, 3 (1988): 426-434, 此为 429。

④ Weitzman, "Before and Af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94.

⑤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图通过斯滕博格的《诗学》一书，使中国读者初步了解他建立在“意识形态文学”和“无误解文本”概念上的圣经诗学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学术界引起的热烈反响及其生命力。

在斯滕博格看来，圣经作为古代以色列的民族文学，^①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学”(ideological literature)，即其自始至终通过叙事向读者灌输一种观念：这一特定的世界模式中具有既定的道德伦理秩序，上帝是其中的主宰，此外别无选择。借用艾力克·奥尔巴赫(Eric Auerbach)的话，圣经叙事的意识形态是“专制的，因为它排斥所有的异议”。^②尽管圣经叙事中掺杂有与这种意识形态相抵触的另类观点，但按斯滕博格的解释，它们只是为了最终能更好地说明圣经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给读者提供另类选择。这种“意识形态文学”的观念强调作者和文本的本意，以及这个本意的单一性和连贯性；主张无论怎样复杂隐晦，文本都是一个内容连贯的整体。斯滕博格的圣经诗学或圣经叙事批评理论，正是以这种结构主义认识为基础的。^③

在作为“意识形态文学”的圣经中，上帝的最大特征在于他的无所不知。圣经叙事最根本的原则之一是叙事者凡事都诉诸上帝的启示，上帝才是圣经叙事背后的那位“言者”，而这位“言者”也自有其目的和对象，即人类。斯滕博格的诗学试图说明，圣经作者运用文学这一间接手段不仅使圣经免于一味地说教，而且在造物主上帝的全知与人类的认识缺陷之间形成鲜明对照，并使这

① Meir Sternberg, *Hebrews between Cultures: Group Portraits and National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Eric Auerbach, *Mimesis*, trans. by Willard Trask, Garden City: Anchor, 1957, 14. Lynn Poland, "Defending Biblical Poetic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68, 3 (1988): 426—434, 此为 429。

③ 有关结构主义方法论的经典论述，可参 Roland Barthes, *The Semiotic Challeng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8，特别是“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Narratives”一章，95—135。

种对照戏剧化。他在《诗学》中通过分析圣经叙事中经常出现的修辞现象,如讽刺、迂回、重复和“裂隙”(gappings)等,论证了那些间接方式如何使读者更好地认识到“言者”上帝的潜在意图,并认识到它们为上帝的各种行为辩护的目的。由此,阅读圣经便成为一种对人类认识缺陷进行治疗的过程(therapeutic ordeal)。这正是斯滕博格在《诗学》一书中及其他场合反复强调圣经叙事阅读的用意所在。^①

《诗学》的核心思想即圣经是一部“无误解文本”(foolproof composition),它进一步阐明了阅读圣经的“治疗”性质。质言之,“无误解”概念是指“真理对所有真诚的读者都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只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每一位读者都能理解圣经中明确的神学观点和道德评判。^②斯滕博格强调“真诚”,即是反对读者违背圣经文本自身的含义或圣经作者的意图,提倡读者完全放弃自我意识,愿意和能够认同圣经的意识形态。斯滕博格坚称圣经叙事的根本原则之一是叙事者凡事都诉诸上帝的启示,这个原则使作者在讲述故事时有一定的想象和发挥余地,而不是只把圣经当成纯粹的历史文献。其实,这种想象和发挥的成分也已“嬗变为历史”,^③同样具有神授的权威性。因而遇到这种被客观化了的文本时,读者必须接受叙事者凡事都诉诸上帝启示的原则,否则就没有机会正确理解圣经叙事,也就变得不可救药。

① Sternberg, *The Poetics*, 47。“其他场合”的例子可参 Meir Sternberg, “Biblical Poetics and Sexual Politics: From Reading to Counterreading,” *Th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1, 3 (1992): 463-488。感谢梁工教授提醒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对该文的关注,并事先提供该文的中文译稿以便统一某些特殊表达的译法,拙文中“无误解文本”(foolproof composition)、“裂隙”(gappings)和“文脉”(discourse)三词即为借用的译法。

② 关于斯滕博格的“无误解文本”理论,详见 Sternberg, *The Poetics*, 51-56。引语见 Sternberg, “Biblical Poetics and Sexual Politics,” 463。

③ Sternberg, *The Poetics*, 34, 128。

斯滕博格的诗学不仅要求读者“诚服”，也追求像他这样的理想化的高水平读者，以达到“心悦”的境界。所以，“无误解文本”理论一方面认为圣经把真理呈现在所有读者面前，另一方面也强调，只有更多了解圣经叙事的含蓄艺术，读者才能在阅读中获得更大的愉悦和收益。^①而要懂得圣经叙事的含蓄艺术，领会圣经通过模糊叙事所表达的意念，不被错误的宗教和道德意识所误导，只有经过训练而获得很强的阅读能力才能奏效。由此，斯滕博格在诗学中建立起能力概念，视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有高低之分，彼此之间有多种能力层次和很大的包容性。^②尽管很难，甚至不可能对圣经叙事达到完美的理解水平，但每一位真诚的读者都有希望和潜力不断提高其水平，从而不断接近完美。

然而，不同的圣经阅读却有不同的目的、视角、范围和限制，这使得它们很难彼此认同。对于斯滕博格的方法和理论，自始至终都有人反对，其中不仅有专治传统圣经研究的学者，还有同斯氏一样将自己区别于传统学术的学者。80年代后半期以来，斯滕博格尤其遇到学界的强烈挑战。进入90年代后，圣经文学批评的势头有所消退，原因有多种：一是解构主义和其他颠覆性阅读策略日益得势；二是接受理论使批评重心从文本转向了读者；三是文化研究逐渐盛行。^③受这些因素影响，有的学者断言圣经文学批评已经不合时宜，^④有的指责它未能充分挖掘圣经的潜能，^⑤有的则把矛头指向其认识论前提。^⑥这些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无非是

① Sternberg, *The Poetics*, 235.

② Sternberg, "Biblical Poetics and Sexual Politics," 467.

③ Weitzman, "Before and Af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94-196.

④ James Kugel, "On the Bibl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Prooftexts* 1, 3 (1981): 217-236.

⑤ Mieke Bal,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A Critical Escape," *Diacritics* 16 (1986): 71-79.

⑥ Long, "The 'New' Biblical Poetics of Alter and Sternberg," 71-84.

反结构主义之道而行,认为文本不再是形散而神聚的整体,读者不再能依据一套确定的规则从事理解活动,因而文本不再是值得关注的中心。

多数批评者认为,斯滕博格的论述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丹娜·费维尔(Danna Nolan Fewell)和大卫·古恩(David Gunn)指出,斯滕博格尽管详细论述了圣经的意识形态性质,他本人也显然是有着意识形态的读者,他却几乎毫不理会读者同样具有意识形态的事实。^①布克·龙格(Burke Long)也认为,尽管斯滕博格否认自己是带有意识形态的读者,他的论著却充满了意识形态元素。一方面,斯氏排斥无论早期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诠释中还是历史批评中的传统主义;一方面,他又拥护传统的宗教理想主义意识形态。这说明他并没有真正脱离传统,或者他只不过裹上修辞的外衣,将自己与理应正视的挑战隔离开来。斯氏也极力反对任何现代的“倾向”,如女权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等,却不反对同时期的圣经文学批评。总之,在客观的名义下,他极力使读者以圣经为本,回避那些现代文学研究遇到的复杂和激烈的多元论问题,把它们完全排斥在神圣领域之外。^②

龙格还指出,对于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斯滕博格的态度也自相矛盾。他在《诗学》中反对新批评主义极端反历史主义的立场及其把文本视为不受时间限制的倾向。他用结构主义方法把圣经文本想象成“言者”和“听者”处在历史当中的一场对话。然而当斯滕博格真正阅读圣经之际,却毫不理会它与历史的关系。^③林恩·波兰(Lynn Poland)也指出,斯滕博格相信,历史学家和文学

① Danna Nolan Fewell and David Gunn, "Tipping the Balance: Sternberg's Reader and the Rape of Dinah,"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10, 2 (1991): 193-211, 此为194。

② Long, "The 'New' Biblical Poetics of Alter and Sternberg," 74, 82-84.

③ Long, "The 'New' Biblical Poetics of Alter and Sternberg," 79-80.

批评家是相互依存的：历史学家若想立足于原始资料，就不可能忽视它的文学传统和文本规则；而文学批评家既然立足于“文脉”（discourse），就不应该像新批评主义提倡的那样只试图理解文本本身的意思，而应同时关心其效果和相关历史。^①但是，斯氏并没有把圣经放在圣经诠释史或神学史关于圣经文本的性质、语言、来源和神圣性的大环境中加以讨论。虽然斯氏认为圣经叙事是信史，但他这一论断的基础是整部圣经贯穿着统一的神学思想，这是当代历史学家们无法接受的。^②

丹尼尔·波亚林（Daniel Boyarin）认为斯滕博格自相矛盾之处还在于，他首先认为读圣经时读者必须搁置怀疑，好比在读一部虚构小说，接着却长篇累牍地论述圣经亦属编史类文献。无论他承认与否，这暴露出他捍卫文本权威的欲望。“无误解”叙事者和“无误解”读者的理论没有给读者留下丝毫违背或抗拒文本意识形态的余地。^③米克·巴尔（Mieke Bal）更为尖锐地指出，由于把上帝读解为圣经叙事的始作俑者，斯滕博格展示的不是诗学而是希伯来圣经神学。^④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以色列人斯滕博格的著作为什么受到许多犹太读者的喜爱。^⑤的确，斯滕博格为圣经研究与犹太解释传统在新时代的相互结合开辟了一条新路，而这条道路无疑有助于加强当今犹太人对圣经的认同感。^⑥

巴尔尤其关注与圣经意识形态不同的主观立场，不管它们是文本中那些违背叙事者或作者意志的，还是读者自己的。她认为，无论是作者还是哪一位读者都不可能完全说明或领会为何叙

① Sternberg, *The Poetics*, 15. Poland, "Defending Biblical Poetics," 428.

② Poland, "Defending Biblical Poetics", 428-429.

③ Daniel Boyarin, "The Politics of Biblical Narratology: Reading the Bible like/ as a Woman," *Diacritics* 20, 4 (1990): 31-42, 此为 35.

④ Bal,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71-79.

⑤ Long, "The 'New' Poetics of Alter and Sternberg," 73.

⑥ Weitzman, "Before and Af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193.

事者需要把不同的主观立场掺合进圣经当中,而不同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回应。在巴尔看来,那些坚持认为只存在一种正确理解的一元性叙事理论,无论是斯滕博格的,还是许多结构主义学者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都不如主张多元性理论更合理。因此,把圣经当作开放的文本,创造性地解读其中可能有的意义,而不是只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或绝对地抗拒传统,显得尤其重要。^①

然而,上述这些攻击和挑战似乎没有给斯滕博格带来太大影响。他坚持己见,并对批评者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这种自卫和反击集中反映在他对费维尔和古恩批评文章的回应(详见本辑第100-136页)中。他认为,他们对他的某些指责,诸如“保守主义”甚至“男性中心主义”等等,原本就是圣经世界所固有的。至于说他企图垄断对圣经的解释,他辩解道,“无误解文本”将圣经最基本的真理展现给最大的读者群,帮助多层次的读者参与阅读,才是真正地打破对圣经解释的垄断,赋予圣经文本在当代社会的生命力。在他看来,费维尔和古恩,以及其他反对者都承继和激化了各种二元对立,因而陷入绝境;“无误解”阅读的一元性则把读者带出了多元性和二元性的泥潭,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②

这样一来,斯氏将他的诗学与其他圣经阅读方法彻底对立起来,并指责后者皆属充满自我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阅读法,是政客或律师的伎俩,因而是违背学术原则和无效的。这种政治性阅读法将先人之见带到阅读当中,强求文本各部分与之附会,结果只会造成不协调。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读或“反阅读”,归根到底是因为它脱离了圣经这个整体去理解某个故事和片断。斯滕博格强调,像费维尔和古恩那样将圣经文本与它的意识形态、文

① Bal,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71-79.

② Sternberg, "Biblical Poetics and Sexual Politics," 463, 471.

脉和价值系统分离的做法不仅违背写作和阅读的性质,也是无法做到的。一种语言反映或制约着一种世界观,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圣经也不例外。因为圣经语言、圣经世界和圣经意识形态彼此相连,都不能脱离圣经文本而独立存在。因此,要么以该语言的内在意识形态为视角,要么以该语言之外的某种意识形态为视角。或者说,读者面对文本要么根据作者原意重建整体,要么无视文本,凭一己之好擅自进行篡改。斯滕博格同时指出,由于对文本的涉及面和圣经叙事方法的连贯性缺乏应有的了解,对语言的考察不精确,费维尔和古恩的批评不可避免地流于肤浅、单薄而缺乏说服力。^①

费维尔、古恩和巴尔等批评斯滕博格的理论不是诗学,却不能建立自己的诗学取而代之。的确,若按照他们的方法建立诗学,即诠释叙事的同时反对从叙事中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无异于缘木求鱼。一些批评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尴尬,故而提出他们的方法虽然不能取代斯滕博格的诗学,至少还可以对它进行补充和完善。他们以为,在对圣经叙事的分析中考虑后结构主义的见解不但无损斯氏的成果,反而能阐明圣经叙事的无限丰富和叙事者的无限智慧,使圣经诗学趋于完善。^②其实,让斯滕博格采纳这种妥协和折衷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诗学本身就是与后结构主义或现代文学理论不相容的。对于斯滕博格,圣经叙事的无限丰富和叙事者的无限智慧反映在文本确定的意识形态下极为丰富的叙事表达方式,以及读者确定的理解下的不同理解层次;对于后者,它们则反映为文本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性,以及读者对文本理解的不确定性。

不管怎样,圣经叙事诗学已成为圣经学的一个专门研究领

^① Ibid., 466-487.

^② Naomi Segal, "[On] Meir Sternberg,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1985)," *Vetus Testamentum* 38,2 (1988): 243-249, 此为 245-246, 249.

域,而斯滕博格早已成为人们公认的一位领军人物。它与其他圣经批评和阅读方法似乎在一种心照不宣的停战状态下相处着。圣经的文学诠释将如何发展尚不明朗,但可以肯定,把圣经视为文学作品并加以理解和赏析不但没有过时,也不会终结;斯滕博格的圣经诗学也因之具有永恒的价值。

作者曹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宗教学硕士、哲学博士(参见本辑第286页简介)。

典,研习和宣讲希伯来圣经。^①这种文本研究和文本外的历史、考古和神学等研究,对于犹太教的圣经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者曹坚,男,原为湖南师范大学讲师,后赴德国和以色列留学十载,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宗教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目前在希伯来大学讲授“希伯来圣经在近现代中国”课程。主要研究旧约语言文学、旧约翻译与诠释及中国近现代思想。近期发表的论文涉及施约瑟旧约官话译本,梁启超、鲁迅等人对旧约人物与思想的评论,现代中国新教知识分子与旧约文学的关系等。

① Avigdor Shinan, “the Aggadah of the Palestinian Targums of the Pentateuch and Rabbinic Aggadah: 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文收 Beattie 和 McNamara 编, *The Aramaic Bible*, 203-217, 此为 217。